

# 走向比较文学: 80、90年代美国普希金研究

林精华

普希金诞辰 200 周年日子的到来, 促使了新一轮普希金研究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 美国不仅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学术界一样, 忙于做普希金研究的世纪性回顾工作、深化诗人的文本研究, 而且集中力量对普希金进行不同方面的比较文学研究, 使得美国不仅在许多理论研究领域引导世界新潮流, 而且在普希金的具体研究上也形成了新的世界性研究趋势。

我们知道, 对普希金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传统做法, 尤其是俄国文化界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 传统的普希金比较研究, 在选题上基本集中于“普希金与拜伦”, 从别林斯基到日尔蒙斯基(《拜伦和普希多》, 1924年, 科学院出版社)无不如此, 而且注重文本思想和诗学形式的平行比较。这种比较研究, 毫无疑问是比纯粹文本研究的视野要开阔, 但把普希金的比较研究局限于这个选题, 就使普希金在许多方面的意义得不到挖掘、研究的范围得不到拓展。于是, 从 70 年代开始, John Bayley 教授就开始在宏观上回顾对普希金进行比较研究的历史, 撰写了著名论文《普希金: 比较研究 (Pushkin: A Comparative commentary)》(1971), 展望扩大对普希金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所以今天美国的普希金比较文学研究, 从选题到具体方法论上都有很大的变革。

借纪念普希金去世 150 周年活动之际, 美国学术界把日益成熟的比较文学方法用到普希金研究上来, 即“普希金与白银时代”。这种在同一种文学中进行比较研究的做法, 不仅吸取了法国比较学派实证方法的长处, 而且也是英美学派自身范围扩展的自然要求。当然, 作为一种学术潮流, 它的出现还得力于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研究作为学术热点在 80 年代开始从西方学术界兴起。正是在这种情形下, 1987 年 5 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斯拉夫和东欧研究中心”在其伯克利分校主办的题为《俄罗斯现代主义的文化神秘性: 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大型全美性的学术研讨会, 专门研究普希金在俄国文化转换过程中的不同影响。这是一次精心准备的研讨会, 该校著名学者鲍里斯·盖斯帕洛夫(Boris Gasparov)教授做了纲领性报告《俄国现代主义文化神秘性中的“黄金时代”及其作用》, 认为现代主义实质上主要是反对俄国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 而普希金对俄国文化的实质是非常了解的(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80 年普希金纪念活动上的讲话可以见出), 因而现代主义产生的依据正是来自普希金的启示, 他认为, 作为一种观念和象征, 普希金的文化作用在 19 世纪只不过是投向了历史结构上, 起了“奠基性”的历史作

用,而现代主义则把普希金视为认识当代文化各个方面的引见(modernism regard Pushkin as present in all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发现普希金把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原则结合成一体。在现代主义创造着文化神话的复杂化体系中,普希金及其时代占据了中心位置。现代主义的自我意识是用普希金的神秘性和带有“普希金本质(essence)”一般性魅力来标志的。所以,对于白银时代的诗人来说,普希金是绝对的和永恒的创造性原则,始终是世界上一个宝贵馈赠。与鲍里斯·盖斯帕洛夫从精神上把握普希金与白银时代文化不同,Irina Papanerno女士(加州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的报告《普希金与白银时代人的生活》则在事实上描述普希金是如何影响白银时代作家的,作者描述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安德列·别雷、勃留索夫和勃洛克等人眼中的普希金形象,并揭示了他们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与普希金的关系。

我们知道,白银时代每一个著名的诗人、作家、思想家几乎都深受普希金的影响,茨维塔耶娃和勃留索夫分别写过题为《我的普希金》论文,安娜·阿赫玛托娃著有《普希金笔记》,霍达谢维奇写有《普希金的诗歌系统》,安德列·别雷甚至作过许多关于普希金的学术报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也正因为这种具体的影响存在,所以美国关于“普希金与白银时代”的研究,更多的是具体细致地研究世纪之交作家创作特征与普希金之间的具体关系,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John Delaney Grossman教授著的《我的普希金:勃留索夫寻找真正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tephanie Sandler教授的《哈伊洛夫斯基记忆中的普希金》(Amherst College),Carol Ueland教授的《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主体学和诗学在幼年中的回声》(Drew University),William Mills Todd教授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普希金三联画:对抒情诗的现代阅读》(Toward a Modern Reading of the Lyric)》(Harvard University),

Monika Greenleaf教授的《梯尼亚诺夫,普希金和断片:透过蒙太奇镜头》(Through the Lens of Montage)》(Yale University and Stanford University),Henryk Baran教授的《赫列勃尼科夫创作中的普希金:主题上几处联系》(Pushkin in Khlebnikov: Some thematic Link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从各自角度解决了许多非常实际的学术问题,非常见功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授John Malmstad居然整理出了杰出作家、思想家和学者安德列·别雷1925年关于普希金的演讲提纲(这是应邀准备在几个地方作的学术报告),而且做了长达10页的详细注解。这种填补空白性的工作,是由作为非母语国的学者来完成的,相当不容易。这些研究,非常细致地描述了普希金是怎样具体地影响了白银时代作家的创作,促使了19世纪俄国文学向20世纪俄国文学的转化。

此外,关于白银时代两次重大普希金纪念活动,也是最近20年来西方学者倍受青睐的选题。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Marcus Levitt把目光投向了《1899年的普希金》,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详细描绘了普希金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情景。与此同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罗伯特·P·体斯(Robert P. Hughes)发表了论文《普希金在1921年2月的彼得格勒》(1987),很逼真地复活了1921年2月的纪念活动规模。他搜集整理出这活动中所出现的各种演讲或文章(谢科列夫的《决斗的普希金》、勃洛克的《关于诗人的使命》、霍达谢维奇的《摇晃的三脚架》、艾亨鲍姆的《普希金诗学手段》、A·F科林的《普希金的道德外貌》、F·索洛古勃的《普希金之死与俄罗斯知识分子》、P·K·古佩尔的《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化》、I·梯尼亚诺夫的《出自埃及之夜的新篇章》等,还有题为《普希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单行本),并着重分析了库兹明的诗作《普希金》,认为正如以前的纪念活动要有拉开序幕的标志一样,这次是库兹明的《普希金》拉开序幕的。在诗中,库兹明宣告普希

金将完完全全地永远“活着”，这个响亮的宣言是对 M·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的直接回答（《诗人之死》，1837 年）。莱蒙托夫用“他死了”表达哀悼，库兹明的回答则是“他活着！”，在首尾两节四行诗中，“生命”、“生”重复使用了八次。莱蒙托夫反复使用的字眼是“死亡”、“革命”、“野火”、“绝望”、“消逝”、“裹上”、“坟墓”、“沉默”，而库兹明则用一系列鲜活的意象重塑普希金。在回顾普希金重大纪念活动中，显示出白银时代作家在诗人 125 周年诞辰纪念活动中，是如何重新理解普希金的。

“白银时代与普希金”是最近 20 年来的重要选题，不仅加州大学专门研讨它，而且其他学者在相关研究中也涉足这个领域。Paul De-breczeny 博士于 1997 年出版的力作《文学的社会影响：亚历山大·普希金和俄罗斯文化》梳理俄国批评家关于《埃及之夜》研究史时，就把白银时代作家与普希金的关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来看待，并认真研究了勃留索夫对主人公克里奥佩特拉形象的认识，分析他的诗作《侏里奥佩特拉》（抒情诗）是如何深受普希金影响的。

## 二

除了“普希金与白银时代”比较研究之外，从浪漫主义诗学角度对普希金进行研究，是比较研究的又一重要方面。

其实，上述的传统做法“普希金与拜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浪漫主义背景下进行的，“拜伦是第一个可以与普希金进行浪漫主义比较的诗人”，<sup>①</sup>这已经是一个基本共识。也正因为这种学术传统的存在，“普希金与浪漫主义”就成为一个常规的命题。例如，早在 60 年代 John Merserau 博士的论文《普希金的浪漫主义观念》（*Pushkin's Concept of Romanticism*）（*Studies in Romanticism* 3/ 1963）就成为后来对普希金进行浪漫主义研究的重要文献。然而，传统的“普希金与浪漫主义”研究，大都限于解释普希金创作中的浪漫主义特征，或普希金思想中的浪漫主义观念范畴，缺乏宏观把握或诗学研究性质。

从著名学者艾布拉姆斯的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和批评传统》（1953）中我们可以了解浪漫主义思潮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然而，该作因为几乎没有涉及到普希金及其所代表的俄国浪漫主义理论和实践，因而浪漫主义运动中的许多重要文学现象，例如“断片（Fragment）”、“哀歌或挽歌（Elegy）”、“东方叙事诗（Orient Poem）”和“反讽（Irony）”等就被忽视了。这些现象名义上是普希金创作中所出现的文体问题，事实上在拜伦、雪莱和雨果等人的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这些文体现象中蕴含着丰富的诗学韵味。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卓有成就的教授 M·格林里夫（Monika Greenleaf）博士历尽艰辛，完成了力作《普希金与浪漫主义方式》（*Pushkin and Romantic Fashion*, 1994）就是立足于对这些文体现象的分析，从文学思潮角度扩展了对普希金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和范围，而且把一个宽泛的文学运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诗学形式的演变过程，使对普希金进行思潮研究变得具体，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对普希金进行比较研究方面最有份量的著作。首先，作者梳理了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以来的“断片”历史，发现“许多古代作品已成为断片，现代许多作品在本质上也会如此”，认为断片是基础诗学的建筑、原初灵感的形式，广泛存在于 18 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伏尔泰的《老实人》）、英国文学（斯泰恩的《感伤的旅行》和《狄狄传》及拜伦的一系列诗作）、德国美学理论（施莱格尔和温格曼等人）、俄国文学（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等人）中，作者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普希金的“断片”与这些人的继承性或超越性关系。不仅如此，作者专门开辟一章“从墓志铭到挽歌：俄罗斯进入欧洲文化”，扩大比较研究的空间，把普希金置于斯拉夫文化和拉丁双重文化背景下研究，一方面描述了普希金接受西方文化及其对创作影响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辨析出普希金所代表的俄国文学在浪漫主义运动中是如何走向成熟的。特别是在“东方叙事诗”问题上作者在深入研究萨伊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上，把

普希金 1821 ~ 1823 年间创作的南方诗篇, 与 19 世纪初欧洲出现的一系列东方诗篇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 从中看出普希金诗作中的“东方性”与拜伦的《土耳其童话》(1814 ~ 1819)、柯尔律治的《忽必烈汗》(1816)、歌德的《西东合集》(1819)、雨果的《东方吟》(1829) 等异同, 即普希金是以带有东方人特征的眼光来看“东方”的, 而其他人的“东方”都是出自西方人的眼光, 这种差别带来各自东方题材诗作上的一系列诗学差别。

另外, 即便是“普希金和拜伦”这个传统的重要命题, 近年来的研究趋势也趋向在浪漫主义语境中进行。接着俄国学者格罗斯曼教授的研究思路(《普希金研究》, 1923 年), Sam Dirver 博士的《普希金: 文学与社会观念》在“夸饰风格(Dandyism)”问题上与拜伦进行了广泛的比较, 认为他们都有这个特点, 但存有时代和民族的差别: 拜伦诗作中的“夸饰”更多的是由于诗人置身于浪漫主义思潮的高峰阶段, 外加心情被压抑而渴望奋斗, 所以诗篇难以节制, 与温尔雅的英国绅士风格大相径庭; 而普希金的创作主要是对普通生活感受的表达, 而其生活常常不顺心, 因而才华横溢的诗人在浪漫主义思潮中的创作, 自然会破坏俄国传统诗歌拘谨风格。此外, 上述格林里夫教授的著作《普希金和浪漫主义》几乎在所有重要诗学问题研究上, 拜伦都是普希金研究的重要参照对象, 在参照中找出普希金对拜伦超越所在。例如, 作者认为在《高加索的俘虏》的“前言”中, 普希金是带着同情心去描绘土著民为生存而斗争的, 结尾则用胜利者的军事颂歌宣布他们的成功, 这种现象是对拜伦“政治正确立场”风格的背离。关于这个选题的重要成果还有, 《俄罗斯小说: 从普希金到帕斯捷尔纳克 导言》(1983), 该书是由弗吉尼亚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和俄罗斯文学教授 John Garrard 先生所主编的, 这 5 万字的导言也出自他的手笔, 该文从影响研究方面推进了这个课题的研究; 而 Monika Greenleaf 博士著的《普希金的拜伦学徒: 文化上不同信仰结合中的问题》(*Pushkin's Byronic*

*Apprenticeship: A Problem in Cultrual Syncretism*)》(*Russian Reviews* 71/94) 则是对这个选题进行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结合的力作。

### 三

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是无限的, 无论是在选题上拓展还是在具体方法上更新, 都可以把一个传统的研究论题推向深入, 并有更多的发现。普希金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 因其自身可阐释余地的丰富性, 这在客观上给比较研究带来了极大的空间, 从不同方面展示了普希金的魅力。早在 70 年代, J. K. Newman 研究员就从文体学角度尝试了对普希金进行比较研究, 通过叙事诗历史的演变过程, 梳理普希金创作与这类文体演变的关系, 从而客观地显示出普希金在文学史上不同文体上所表现出的意义(《比较文学研究》1972 年第 9 期)。

拓展跨文化比较研究范围也是近年来的趋势, Paul Debreczeny 博士在 1997 年出版的力作《文学的社会影响: 亚历山大·普希金和俄罗斯文化》中专门辟出一章《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A Comparison with Shakespear*)。作者从戏剧体制角度比较这两个剧作家, 认为如果普希金对于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们来说是太完美了, 那么莎士比亚也如此。从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研究史的分析中, 他发现普通观众对他们看法具有相近性, 而且从教育史上发现他们都是在 19 世纪后半期进入中学教材的。甚至从戏剧演出史上作者也发现, 美国在 1908 年生产了 10 部来自莎士比亚剧作的电影, 而好莱坞却没有上演一部莎士比亚的作品, 同样也没有把普希金的任何文本搬上舞台。

而 Walter Vickery 先生著的《普希金: 俄国和欧洲》(*Pushkin: Russia and Europe*) 对普希金思想和诗学的东西方文化特征做了精辟的论述。此外, 上述格林里夫博士的力作《普希金与浪漫主义方式》也具有这种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特征。

普希金生命力的无限性特别充分地体现在流亡国外的俄罗斯作家身上, 这种现象启发了

俄裔美国学者的普希金研究,最著名的是美国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谢尔盖·达维多夫(Sergei Davydov)教授(他以研究纳博科夫著称,有著作《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文本》,1982),他发表了很有影响的论文《在普希金的天平上称纳博科夫的天赋》(1989)。根据纳博科夫《天赋》这部包容浓厚俄国文化传统因素的作品,作者深入剖析了普希金与俄国文化变迁的关系。因为研究对象原因,这种研究方法成为比较文学走向历史化的重要借鉴。

是苏联解体之后兴起了又一个影响研究选题,即“苏联文化与普希金”。这方面主要以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 Debreczeny 博士最有成就,他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苏联社会如何阅读普希金,他发现从1918~1936年间苏联出版了普希金的作品达到335种、1860多万册,但是这种传播(dissemination)是被视为一项政治任务来看待的。<sup>②</sup>通过这种研究,作者总结道,因为苏

联文化在处理传统文化问题上渗透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因而普希金对苏联的影响未必全部是积极的。

即便是对普希金进行文本研究,也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著名学者T·肖(Thomas Shaw)教授的力作《普希金的意外之诗:韵律诗中的无韵诗行和无韵诗中的韵律诗行》(*Pushkin's Poetics of the Unexpected: The Nonrhymed Lines in the Rhymed Poetry and Rhymed Lines in the Nonrhymed Poetry*, 1994),是用比较文学方法对普希金进行文本研究的重要著作。

---

注释:

①MonikaGreenleaf: *Pushkin and Romantic Fashion*,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University, 1994, p. 19

②Paul Debreczeny: *Social Functions of Literature*, Alexander Pushkin and Russian Cul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1997, pp. 218~220